

追求人民幸福：「中國式現代化」的價值革命與話語重塑

張鈞凱

《風傳媒》主筆兼兩岸中心主任
政治大學兩岸政經研究中心研究員
原鄉人文化工作室執行長

「我認為一個國家的偉大，不在於它的人民富有，而在於它的人民幸福。」
——孫中山，〈對外宣言，附：孫逸仙宣言〉，1922年8月17日

前言：從「哈佛中國女孩」跌落神壇談起

美國哈佛大學一向被視為全球首屈一指的頂尖學府，其學術研究與師生群體，更體現了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價值觀與話語體系。不過，今年5月29日哈佛大學畢業典禮，由來自中國大陸青島的女孩蔣雨融做為畢業生代表，以「我們的人性」(Our Humanity)為題發表演說。隨之而來的不是掌聲，而是太平洋兩端的罵聲，其內容充斥著西方「自由派」的DEI理念，不只中國大陸輿論場不買單，連美國社會欲推倒菁英建構起來的建制高牆民意也看不下去。

關鍵在於，蔣雨融就讀「國際發展」(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)學院，喊著「地球村」的口號，可是眼見世界正在起火，以色列在美國的支持下對加薩巴人進行種族滅絕，俄烏戰爭背後也有美國毀約推動「北約東擴」的背景脈絡，又在台灣力推「巷戰」與「城鎮戰」，「地球村」顯得格外諷刺又虛偽。表面上蔣雨融成為箭靶，但從世界大歷史的宏觀角度來看，確實是一次關鍵的轉捩點，象徵美國與西方價值體系正處於土崩瓦解過程的現實。在客觀上，隨著中國崛起這個重要變量，也說明了世界即將面臨一場價值革命與話語重塑。

一、「西方價值共同體」的菁英民主本質

中美博弈格局的形成，本身就是奠基於西方思維的產物，亦即「修昔底德陷阱」(Thucydides Trap)，認定世界霸權國家「臥榻之側，豈容他人鼾睡」。與中國傳統思想追求的「天下大同」，乃至孫中山從《禮運大同篇》提煉出來的精髓「天下為公」，完全是迥異的精神層次與境界。但由於西方價值觀在後冷戰時期「歷史終結論」的意識形態宰制，致使包含台灣在內，往往都習慣於透過西方的眼鏡來看待世界的變局。

事實上，今日對於西方政治、經濟與社會制度的「認受」，無形中仍奠基於上層建築與下層建築的雙重制約。德國學者毛斯費德(Rainer Mausfeld)提出「西方價值共同體」的說法，敏銳地指出眾人對此習以為常的背後，其實是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「資本主義民主」，也就是由菁英壟斷話語的民主體系，「菁英的決定被視為市場中的理性和自然秩序，另一方面以全球化之名，新自由主義創造了財團這樣的角色，以經濟實力換取政治權力(或相反)。」¹

在資本主義民主趨於失靈、失效、失治之際，政治人物與知識分子開出的藥單卻是「民主、民主、更多的民主」，²歸根結柢，只是在掩飾和掩護既得利益群體

¹ 萊納·毛斯費德著，趙崇任譯，《羔羊為何沉默？菁英民主與新自由主義對社會和生活基礎的摧毀》(台北：南方家園，2022年)，頁vi。

² 例如「大罷免」發動之前，賴清德在2024年12月21日曾說過：「民主的紛爭要用更大的民主來解決」。

的權力與權利。在「民主」的迷幻藥之下，民眾對於社會矛盾與困境的看法，也被「金權階層」所左右。台灣社會「小確幸」心理的瀰漫就能說明一切，長年以來台灣青年處於低薪、高房價的惡性循環中，政治人物卻可以用「抗中保台」、「捍衛民主」等話術，便把社會民生問題「外部化」。而人們則以「至少我們還能投票」為自滿、自豪，實則自欺欺人，妖魔化中國大陸為「民主替罪羊」。

在此政經結構底下，本應做為歷史與現實主體的「人」，被異化為「民主」、「自由」、「人權」等所謂「普世價值」的附庸，把不合理當成合理，無疑「自我奴化」。舉例言之，如果民主是「人民作主」，那麼美國和台灣要靠著「大撒幣」才能取得候選資格，如此做法甚至可以追溯至雅典民主，透過財富在政治上將人民分為三六九等。無怪乎曾在美國耶魯大學政治系任教十年之久的政治學家王紹光，曾犀利地批評資本主義民主的本質根本是「選主」，「把以『選主』為主軸的體制當作實現民主的唯一途徑」，「對他們而言，歷史彷彿真的終結了，人類社會似乎只能按這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方式運作，這是絕對荒謬的。」³

二、中國大陸「以民為本」的再分配改革

問題在於，人民切身相關的幸福感與獲得感，能靠著資本主義民主自我麻痺多久？在新冠疫情肆虐之前，美國歷史學家史奈德(Timothy Snyder)只因急診住院，便已深刻感受到標榜民主、自由、人權、平等的美國，醫療體系被金權箝制、被政治操弄，底層人民生活在「死亡邊界」，⁴應驗了「有錢判生、沒錢判死」的形容。

相對於此，一向被視為「沒有民主」的中國大陸，則隨著綜合國力的上升，開始向世界提供另外一種價值觀，以及由此延伸出來的話語體系。特別是習近平時代，至少從2015年開始提出「人類命運共同體」的表述，相應出現的則是「中國式現代化」的論述，並正式寫入2022年中共二十大報告之中。在這些官方的宏觀敘事下，其核心要旨，若要以平易近人的話語描述，不外乎兩點：「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」，以及「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，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」，可以看出中共在理順政府與市場、社會主義與中國傳統等關係之平衡。

因此，整頓房市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，訂定《反不正當競爭法》(整頓「內捲」亂象)，這些外界看似違反經濟學原理的做法，冠之「國進民退」的標籤，實則是對中共主導社會變革的極大誤讀，在西方濾鏡下炒作出來的假議題。很明顯的，中國大陸正在調整「再分配」機制，不再以利潤的極大化(暴利)為追求目標，而是在合理的利潤下，讓經濟發展的紅利不再被資本家所把持，而能夠讓民眾實際看得到、摸得到。中國大陸經濟的趨緩，可視為整體體質調整的陣痛期，但不可忽略仍維持了5%增長率的水準。

中共官方經常強調的「供給側改革」，從西方政經體系的角度來看，自然摸不著頭緒。但在新興科技爆炸式發展的時代，中西方科技產業的趨利導向出現了可見的重要分歧。「科技」與「人民」究竟誰是主體，成為了兩條現代化道路的選擇。以電動汽車為例，特斯拉(Tesla)與比亞迪(BYD)的價格天差地遠，但中國產製電動汽車的品質與性能非但沒有落後，甚至不斷突破與創新。這也說明了，為何歐洲批評中國「產能過剩」的同時，比亞迪在汽車製造大國德國的銷售量，今年已第三度超越了特斯拉。

換言之，「中國式現代化」的主體在於「人民」，民生福祉理應是民主不可或缺

³ 王紹光，《民主四講》(北京：三聯書店，2009年)，頁255。

⁴ 提摩希·史奈德著，廖珮杏譯，《重病的美國：大疫情時代的關鍵4堂課，我們如何反思醫療、人權與自由》(台北：聯經出版，2020年)。

的要素，而不是僅有形式上的投票選舉。據此內涵，科技的進展，應該是普惠於百姓，用以服務於人民生活的改善與進步。新興科技絕非金字塔頂端少數人的專利，也不是遙不可及的想像。中國大陸在無人機、電動汽車、人工智慧(AI)等方面的成果，使得科技產品走向「白菜價」，一般民眾都能以合理的價格應用於生活之中，對西方大廠的巨額利潤營收模式造成了極大壓力。這也是包含台灣在內，西方世界屢屢以民粹政治的「中國威脅」、「國家安全」等話術口實，防堵中國科技產品進口的內在主因，就為避免資本與政客原有的龐大利益受損。

三、結語：中國式現代化實現孫中山理想

「中國式現代化」正在顛覆西方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民主的政經邏輯，也正在改造與重塑原來由少數人把持的畸形金字塔結構，進而改寫西方主導的經濟學理論，重新定義原有對於「利潤」的認識。⁵回歸到人民的真實生活需求，以人民的幸福為依歸，而非「1%」說了算，更非由意識形態來做決定。

以民為本、公平普惠、合理分配，在可預見的未來，將成為中國向世界發出的全新價值體系與話語號召。孫中山百年前「求中國之自由平等、謀社會之文明發展、達經濟之民生樂利」的理想，⁶如今正透過「中國式現代化」的實踐，向世界展現中國的精神面貌與心理底蘊。

⁵ 張鈞凱，〈我在騰訊全球總部看到最震撼的一幕〉，《風傳媒》(2025年9月1日)：<https://www.storm.mg/article/11064178>。

⁶ 雷倩，「我命由我不由天：21世紀亞洲與全球南方的選擇」，台北清華論壇演講(2025年5月8日)。